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1951年5月、1954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相继召开。随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党的宣传工作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适应新民主主义纲领方针的宣传,向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转变。

健全宣传部门工作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宣传部门面临机构设置不完备、宣传系统干部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为了适应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及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建设,客观上要求有系统地建立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健全党的宣传工作机构。

为了明晰和完善宣传部门的机构设置,1949年11月1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关于宣传部工作情况及机构设置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把宣传部重新健全起来,成为今后的重要工作。之后经过中央开会讨论,拟定了中宣部的机构设置方案。干部是党的事业骨干,宣传部门的干部是党的宣传事业骨干。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宣传部门的干部配备严重不足。1953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南局批发广西关于宣传工作组织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当时全国各地宣传干部的缺额很大,据调查,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县委还没有配备宣传部长。中央要求根据以上情况及广西的报告,急需迅速将宣传干部配齐,并将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宣传部的编制建立与充实起来。

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机构的逐步健全,在中央人民政府层面设置了专门管理文教工作的行政部门。为了厘清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的工作职责,中共中央在1949年12月5日发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此后均应经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管理,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这样就明晰了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各自的工作职责,有利于其各自作用的发挥。

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的分工虽各有不同,但依然贯彻了党管干部的原则。1954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试行党的各级宣传部管理文教干部的实施方案(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在短期内将省市以上宣传部的干部管理机构建立起来,并根据具体情况,逐步将文教干部交由宣传部管理。方案(草案)还规定了各级宣传部管理文教干部的基本任务。1955年召开的文教干部工作会议,对管理文教干部的范围、职务名称等作了具体规定。

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1951年5月7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研究和制定宣传工作方针政策而召开的首次全国性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全国胜利后,针对当时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是在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中造成的宣传工作的经常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不足,着重讨论和解决了四个问题:把党的群众宣传工作经常化、整顿党内外的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改善党对宣传教育工作的管理和党的宣传工作机构。

5月23日,大会闭幕。刘少奇作了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总结报告。他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这个角度,高度评价了我们党过去的宣传工作。对于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任务,刘少奇指出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对于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宣传工作必须与各级党委所定下来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但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不止是搞当前的时事政策宣传,而且要作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和《关于加强工农读物的出版工作的决定》两个文件,确定了党在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推动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把向党内外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并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进行。

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随着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党在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把这条总路线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的宣传工作的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必须从适应新民主主义纲领方针的宣传,向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1954年5月5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运动经验,特别是总结1954年冬1955年春结合计划购粮、互助合作、准备春耕等工作对农村党员和群众进行的关于总路线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制订在当前总路线宣传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顿和改进党在人民群众中宣传教育工作的办法。

5月7日,中央宣传部部长习仲勋作了题为《党的宣传工作为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1951年5月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在目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斗争。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为贯彻党的总路线而斗争,党关于总路线的宣传首先要使全党的思想在新的水平上统一起来,使全体党员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5月27日,习仲勋作大会总结,指出主要收获:第一,解决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第二,对我们宣传工作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检查和整顿;第三,依靠集体经验和智慧,充实和修改了两个决议草案和总报告。

这次会议总结了1951年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年来的经验,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顺利实现了第一次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着重于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宣传,配合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转向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宣传教育全国人民,统一了思想,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摘自《学习时报》 文/韩晓青)

探寻北京的南洋痕迹

近代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回归祖国者众多,他们或投资实业,或兴办教育,或投身革命,为中国近现代各项事业发展出力甚巨。北京就有不少南洋华侨在此工作生活,乃至终老于此,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历史痕迹。

顺着朝阳门南小街南行百余米就可向东拐入赵堂子胡同,这里有"中国现代月季奠基人"、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吴赉熙的故居。吴氏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06年从剑桥毕业后并未行医,1914年到中国东北,后到北京,从事过多种职业,还活跃于欧美同学会等群体。吴赉熙的兴趣和重心转向艺术文化,温源宁形容吴氏"对自己外貌的这种漠不关心,实际是他心灵活动的外在表现,他的心灵永远航行在陌生的海洋",也就是"思想的海洋"与"美的海洋"。为后人所熟知的,是吴赉熙在赵堂子胡同4号宅内开辟出一个"吴家花园",引进栽种了200多个品种的月季花,常有名流来此赏花聚会。1951年,吴赉熙去世前将月季事业托付给蒋恩钿照料。今天,"吴家花园"已无从觅见,但吴赉熙的月季事业在蒋恩钿手里发扬光大,漂亮的鲜花开到了更多地方。

回到赵堂子胡同西头,马路对面就是东堂子胡同。东堂子胡同南侧东起第二栋矗立着的洋房,就是旧门牌55号的伍连德故居。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人,在清宣统年间成功以现代医学方法扑灭东北鼠疫,后来又致力于建设中国现代医学事业。据其回忆录《鼠疫斗士》记载,他于1912年购得宅子后改建为一座两户相连的三层西式建筑,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份,对于伍连德来说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伍氏夫妇育有三子,惟有长子伍长庚长大成人。伍长庚留学归来,子承父业,在这年6月成婚。然而长子婚后不久,与伍连德相濡以沫的夫人黄淑琼病逝。加之国家遭难,伍连德重返南洋。1942年,留在北京的伍长庚因染结核病去世。1949年,伍连德将此宅捐献给中华医学会。

此次走访,笔者欣喜地发现伍连德故居已经完全腾退清空,露出干净漂亮的外观。全国政协委员邢念增曾提出建议,用好伍连德故居,建立伍连德现代医学纪念馆。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场所建立类似的纪念馆、博物馆,将大大有助于公共卫生、爱国主义等主题的宣传教育。伍连德先生倘若泉下有知,亦当足以慰怀。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存在于遂安伯胡同29号的南洋俱乐部,是一些南洋华侨中的知识分子进行联谊社交的重要场所。虽然这个俱乐部经历城市变迁已不复存在,但是仍可以顺着这条线索来探寻北京的南洋痕迹。当年俱乐部委任了四位信托人,上文提到的伍连德和吴赉熙就是其中两位。

俱乐部的另外两位信托人林宗扬和林可胜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林宗扬祖籍福建海澄,生于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1916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曾赴北京短暂工作,后又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后回中国。20世纪20年代,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讲师、副教授,从事微生物学的教研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升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并曾担任教务长。林可胜是侨领林文庆的长子,生于新加坡,1920年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系主任。林可胜还是中国生理学会的首任会长、《中国生理学杂志》的首任主编,抗战时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治伤员。

有关南洋俱乐部的更多细节散落在各种材料里,今人很难为它拼凑出完整的图景,留待进一步的挖掘研究。但华人俱乐部在当今的新加坡依然存在,有名的怡和轩俱乐部、吾庐俱乐部等都是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华人俱乐部,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照和想象。但通过上述基本人物及信息,已经能够结合城市历史地理和实地走访考察,勾勒出南洋华侨在近代北京的活动场面。几位主要人物,他们大多出身南洋富商家庭,拥有医学专业背景。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场所、工作场所与社交场所分布非常集中,来往极其便利,打造了一个松散的南洋华侨知识分子精英群体。

他们没有留恋优渥的物质条件,而是秉持报国的情怀和远大的志向,不远万里回到祖国开拓新的事业,造福于近代中国经历各种磨难的土地和人民。探寻北京的南洋痕迹,其中既有值得铭记的历史贡献,也有可供弘扬的当代价值。假如能够在伍连德故居建立相关的纪念馆,那么也应该对通过南洋俱乐部联结起来的同时期南洋华侨在京重要人物,尤其是医学先贤的生平事迹予以介绍展示,以纪念他们的贡献成就,学习他们的宝贵精神。

(摘自《北京日报》 文/雷环捷)

"只见公仆不见官"

——朱德同志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

在朱德同志60岁生日时,董必武作了《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其中有一句:"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朱德写诗和道:"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今年12月1日是朱德同志诞辰136周年纪念日,每当回想起"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作风,无不感动于朱德"甘为民仆耻为官"的公仆情怀。

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延安时期党的优良作风。延安时期,虽然生活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干部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点一灯油,彼此间情深意厚,亲如一家,"只见公仆不见官"就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为谁做官、如何做官的真实写照。

延安时期的朱德同志

既是总司令 更是普通一兵

朱德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的士兵。他一生功勋卓著,声名显赫,同时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的扁担"就有口皆碑。当时,随着红军队伍扩大和敌人围攻封锁,部队给养严重短缺。为了解决井冈山上急需的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动了下山挑粮运动。朱德经常带头穿双草鞋,戴个斗笠,与战士们一样,挑着50多千克粮食翻山越岭。指战员们不忍心40多岁的军长与年轻人一样受累,都劝他不要挑粮了,还私下藏起了他的扁担。可谁也没有想到,朱德自己动手用毛竹做成了一根新扁担,并在上面刻了"朱德记"三个字,又与战士们一起挑粮了。军长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老百姓。人民自发编了山歌:"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长征途中,朱德与广大指战员一道,"以不可思议的英勇精神进行战斗"。不仅要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战胜天险、雄关、雪山、草地和饥寒交迫。红军过草地时,起初每天两餐,每餐每人二两炒面,后来干粮没有了,只能吃野菜和牛皮带充饥。朱德闻讯后,立即带领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他还亲自拿着野菜对大家说:"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部队在炉霍地区休整时,朱德与军部党校学员一样,吃青稞面做成的糌粑馍。一天,炊事班拿来了50多包大米,准备给首长和学员们改善伙食。朱德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目前,党和红军都面临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伤病员,把这些大米都送给他们吧!伤病员比我们更需要改善生活。"学员们明白,总司令心里考虑的根本不是自己,即使有了物质条件也总是首先想到别人的困难和需要。

升官发财莫过来

朱德一生不爱财,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突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1937年,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他在致函四川的亲属时指出:"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为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

朱德在革命中战功显赫,身居要职,但却非常清贫,他曾致函戴与龄:"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批评了一些作家认为延安生活太苦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丑"的,并自豪地说:"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他曾高度赞扬左权同志"生活艰苦,从来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刘伯承同志"埋头苦干,克己奉公,艰苦朴素,自奉很薄",也曾赞颂"母亲勤劳俭朴的习惯"。

朱德不恋官,不爱财,他一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了普遍的赞誉,1937年,红十五军团成立了朱德青年队,该队表示要学习朱德的五个特长,其中之一就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1946年,为祝贺朱德六十寿辰,中共中央送给朱德的祝辞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1948年,陈毅在《向朱总司令学习》的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六个品质,其中之一就是:"生活非常朴素"。他自己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自豪地强调自己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当官",只为"做事";认为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以个人的"光荣"为目的是可耻的。1947年,他在元旦广播词中提出:"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办。"可见他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为耻的作风。

只见公仆不见官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六十岁生辰,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祝寿活动。董必武在《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中这样评价朱德:"革命将军老据鞍,豺狼当道敢偷安?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乌延黎庶欣公健,此日江南一例欢。"这首祝寿诗,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由衷之言。朱德为答谢董必武诗依韵和诗写道:"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甘为民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清正廉洁作风的真实写照。

据延安时期担任朱德贴身警卫的管开智回忆,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在八路军总部王家坪驻地开荒种了三亩菜地。其中二亩三分地在王家坪菜园里,还有五分多地在延河边上。在开荒种地中,朱总司令像小伙子一样,苦活累活抢着干。每到干活时,年过半百的他,总是首先抢一把最大的镢头,同志们想给他换把小的,朱总司令说啥也不干,还笑着说:"别看我年纪大,可我的身板结实,骨头硬着呢!"在延安,朱德拾粪是有名的。往往是天蒙蒙亮,他就背着粪筐出去了,到吃早饭时,他总能满满地背回来一大筐的牛粪。朱总司令仗打得好,菜也种得好。"他种的西红柿有饭碗那么大,谁看了都赞不绝口。"当时中央不少单位还专门组织大家前来参观他种的西红柿。

总司令带头,广大干部身体力行,给延安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召开中共七大时,中共中央扎根延安已是第11个年头。大会首次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许多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延安作风,无不为之感动,他们忍不住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

要接班不要接官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朱德"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而作为家长,朱德却对后辈有着严格的要求。

他要求孩子们不要有特殊思想。跟家人约法三章: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他常说: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能到工农中去了。干部子女往往自以为比别人优越,这是十分要不得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朱德同志当年写诗赞扬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只见公仆不见官',他自己就是人民公仆的典范。"如今,朱德同志已经离开我们46年了,但每当回想起他的故事和谆谆教诲,我们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在他的身上,处处体现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他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家风让我们受益终身。

(摘自《人民政协报》 文/管 严)

官陡门战斗:长途奔袭"虎口拔牙"

1939年1月21日凌晨,新四军第2支队第3团在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带领下冲进官陡门伪军据点,从开始攻击到结束战斗用时8分钟,连同清扫战场也不过20分钟。此次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上演"虎口拔牙",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新四军挺进苏南后,日军在苏南地区以交通网为基础构筑封锁线,在封锁线内又建立了众多据点,企图以此来压缩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日军的封锁线和据点构成了棋盘式布局,而官陡门据点就处在棋盘中心位置,粟裕称其"恰恰和象棋盘中心卒前面的渡河点一样"。

官陡门位于安徽芜湖东北郊,是一个小镇,东西街道不过百米,南北方向上扁担河穿镇而过,一座百米长的小木桥连接河两岸,小镇四周河网密布,沟汊纵横,地形险要。距离官陡门不到3公里处有一座日军机场,有日军重兵驻守;而官陡门作为日军守卫机场外围的重要军事据点,也驻守有300多名伪军。

为加强官陡门据点的防御,日军沿河两岸修筑防御工事,设置多层铁丝网、障碍物和掩体战壕。官陡门南面4公里的永安桥、北面5公里的年陡门也均有日伪军据点。遇有紧急情况,半小时之内,各方守敌就能驰援。此外,从附近机场起飞的敌机不到两分钟就可以飞临官陡门,进行低空扫射、轰炸。

为打破日军的分割、封锁和分区"扫荡",争取战场的主动权,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经过充分酝酿和周密筹划,决定率第2支队第3团远程奔袭,直插敌人的心脏地带,一举拔掉官陡门据点。

为打好这一仗,早在1939年1月初,粟裕就派侦察员摸清了官陡门地形和敌人兵力部署,并进行了几次夜间战斗、白刃战、河川战、街市战演习,做好了充分的战前准备。

18日清晨,粟裕对参战的第3团官兵做了简短动员,继而率部从宣城狸头桥出发,沿着丹阳湖东岸冒雨迂回向北行进25公里,而后停止行动,隐蔽休整宿营。19日下午,粟裕组织部队悄悄上船,隐蔽向西渡过丹阳湖。21点,部队弃船翻过堤坝,改乘预先准备好的船,继续沿内河向西行进。3个小时后,部队秘密行进到第二个预定集结地点——距官陡门约40公里的一个村庄。部队决定在此处进行隐蔽集结,等到20日夜继续西进。

20日中午,粟裕召集排以上骨干,逐一分配作战任务,要求大家在20分钟内完全解决战斗,并迅速集结准备撤退。傍晚,粟裕下令进攻官陡门。部队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向西疾进,于20时到达青山和黄池两据点间的亭头镇。

按照战前部署,粟裕派兵从南、北两面向青山和黄池的敌人据点隐蔽前进,以阻击增援之敌,保护部队回撤时的安全和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攻击部队则继续在夜色掩护下长途奔袭,直逼官陡门。

21日凌晨2点,部队行至离官陡门不到10公里时,遇到一条河。由于担心渡船已被敌人封锁,粟裕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多绕5公里的距离,走陆路。

为了把绕路的时间抢回来,粟裕命令部队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的作风,跑步急行军,必须赶在天亮前发起攻击。部队借着夜幕疾进,巧妙地绕过敌据点,终于在21日凌晨4点赶到距官陡门约2公里的王石桥,占领了冲击阵地。

按照作战计划和任务部署,攻击部队分成两部分展开:粟裕率主力沿扁担河西岸北进,另一部则沿河东岸北进,对官陡门据点形成包围夹击之势。部队贴着堤坝隐蔽前进,在距官陡门据点几百米时,突击队派出尖兵进行攻击前的侦察。

根据侦察员报告的情况,粟裕果断发出行动命令。突击队匍匐前进,逐渐向官陡门据点靠近,第二梯队紧随其后。当突击队运动到距敌不到30米的铁丝网前,正拉开障碍物时,触响了警铃。粟裕命令部队立刻发起进攻。不到2分钟,攻击部队就顺利突破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冲了进去。还在睡梦中的伪军大部分来不及抵抗就被解决了。

这时,河东岸也响起了枪声。趁敌人惊慌失措之际,粟裕指挥部队冲向河边,快速夺取小木桥,然后过河协助东岸部队,一举攻占了伪军司令部。战斗仅用8分钟,连同清扫战场共用20分钟。等周围据点的敌人反应过来时,粟裕已率领部队安全回撤。

奇袭官陡门,新四军大获全胜,以轻伤两人的代价,歼敌200余人、俘敌57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挫败了日伪军对芜湖、当涂等地实施分割、封锁的计划。

(摘自《解放军报》 文/孙楚艺 吕 超)

讲述